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

中国哲学史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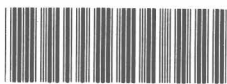
刘文英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1562797

3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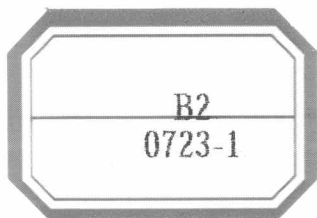
CS1713377

中国哲学史

上卷

刘文英 主编

B2
0723-1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重庆师大图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全2册 / 刘文英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0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

ISBN 978-7-310-04031-5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哲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737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30.125 印张 4 插页 856 千字

定价:75.00 元(上下卷)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编者说明

本书是配合“面向 21 世纪哲学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为哲学系本科生学习中国哲学史而编写的一部教材。也可以作为其他专业选修或自学中国哲学史的参考书，还可以作为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入门书。我们力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新成果和新面貌，从整体上系统地梳理中国哲学的历史脉络，全面地展现中国历代哲学的丰富内容，尽可能突破旧的思想模式，实事求是地揭示中国哲学史的普遍价值和民族特色。

全书共十编，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下卷包括宋元明、明清之际与清代中期和近代、现代时期。由刘文英负责总体设计和统稿。各部分的撰稿人分别为：导言，第一、二、三编，刘文英；第四编，严正（第一到第七章）、刘文英（第八章）；第五编，李翔海；第六编，刘文英（本编前言，第一、二章）、吴学国（第三、四、五章）、康中乾（第六、七、十章）、严正（第八、九章）；第七编，韩强（第一到第十章）、刘文英（本编前言）；第八编，韩强（第一到第七章）、刘文英（本编前言）；第九编，周德丰；第十编，曹跃明。

教师在使用这部教材时，一般内容可由学生自学，课堂上只作重点讲授、提示和辅导，并有计划地组织课堂讨论。由于中国哲学史上有些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而中国哲学史学科本身在不断地发展，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提倡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而不受教材本身的限制。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校、系领导和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疏漏和错误之处一定不少，诚恳希望学者、读者多提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修改和提高。

编 者

2001 年 7 月于南开大学

导 言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反过来，中国哲学又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不但为中国哲学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和优美的人文环境，而且直接孕育和诞生了中国哲学，并一直滋润着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源源不断地为它提供思想营养和精神资源。中国哲学诞生之后，作为中国文化有机的与特殊的组成部分，它又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经验与精神智慧，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感情和意志，并把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创造出灿烂辉煌、气势恢弘的东方文明？为什么在饱经忧患和屡遭挫折之后，能够不断自我更新，走向胜利，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一种“自强不息”的毅力与意志，有一种“厚德载物”的胸怀和气魄。然而，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只有通过中国哲学的提炼、集中、加工和理论化，才能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自发变为自觉，从而成为一种强大的、经久不衰的精神力量。

中国哲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伴随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前进步伐，中国哲学迄今已经延续了三千多年。早在史前时代，我们从先民的创世神话和宗教信仰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萌芽，而黄帝及尧、舜、禹诸先王的实践智慧则为中国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更重要的思想资源。公元前 11 世纪的殷周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其标志是《周易》古经的成型，箕子《洪范》的传授，还有周公提出的敬德观念与礼乐观念。从此，中国历代都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以圣人、贤者、智者、隐士、名士等等不同身份，在中国大地上立言立教，讨论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前后相继，汇成了中国哲学史的长河。大体说来，整个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开拓和探索的时期。起初是一批

先哲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思考天道与人道的有关问题。随着思想资料的积累与理论的系统化,从春秋末期开始,相继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哲学派别,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与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哲学均以标新立异、自成体系为时尚,最富原创性和探索性,由此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理论视野,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秦汉至明清的中国哲学表面上不如先秦时期那样活跃,实际上不断地在发展,不断地在深化,其理论思维不断提到新的水平。儒家哲学在西汉中期被定为一尊,其影响十分深远。但汉初崇尚黄老,魏晋玄学大兴,都经历了儒、道两家哲学的消长与互动。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又出现了儒、道、佛三家哲学的并行发展与消长互动的新局面。宋元明清时期,儒家通过扬弃和吸纳佛、道两家的有关思想成分,实现了理论重构与自我更新,又以理学形态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理学内外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倾向。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和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走向,中国传统哲学也进入转型和创新的时期。近代、现代西方哲学曾对中国哲学给予极大的冲击,中国哲学虽然经历过思想的困惑与徘徊,但其历史传统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在选择和消化外来哲学资源的过程中,不断为自己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一批中国哲学家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为融合中西哲学和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曾进行过多种尝试。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融合,是最伟大的尝试,并在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则是近代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分类的影响而逐渐确立的。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原无“哲学”之名,这个名词是从西方翻译引进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中国的“哲学”之实作为探讨天道、人道及其关系的学问一直在所谓“经学”和“子学”的形式下存在,因而中国哲学史也一直在综合性的学术史或思想史中演变与发展。20世纪初,较早受到西方影响的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光汉、陈黻宸、谢无量等,他们在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过程中,开始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钩稽和论述中国哲学史的内容,甚至使用了“中国哲学史”之名,但他们的工作在整体上尚未突破所谓“国学”的框架和传统学术史论的窠臼。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

大纲》(上卷)出版,这是第一部自觉运用近代学术观念、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确立。但是他的《大纲》以西方实用主义为指导,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只关注实证理论与逻辑学说,有很大的片面性。30年代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这是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通史,其影响超过胡适的《大纲》,但是冯友兰的通史以西方新实在论反观中国哲学,同时继承了儒家人文主义的传统,只是突出所谓共相问题和精神境界问题,也有很大的片面性。30~40年代,吕振羽、范寿康、张岱年、侯外庐、杜国庠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挖掘和清理中国哲学自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传统,则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方向。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讲义,着重考察中国哲学固有范畴和问题的历史演变,无论是思想内容或体例形式都有自己的特色。侯外庐等相继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突出一些非“正宗”的“异端”思想家的贡献,超越了传统的道统观念,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50年代以来,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方针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大踏步地前进。其间虽有“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一再作祟,但广大学者的辛勤工作,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拨乱反正,中国哲学史研究也突破了教条主义设置的一些禁区,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在老年、中年和青年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由于自觉地面向现代,面向世界,出版了一大批有功力、有创见的中国哲学通史、断代史、专门史或专题史,开辟了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的新局面。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和海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有长足的进步和特殊的贡献。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如何认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重要问题。在历史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本来分别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中的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由于文明类型的不同,加上长期分区并立、独自发展,必然形成不同的民族传统与哲学系统。自明清之际,东西两种哲学系统发生接触,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学也传入西方。近代的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学者,曾对中国哲学抱以热情赞赏的态度。但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支配下,中国哲学

长期遭到贬低和鄙视,或是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或是认为中国哲学尚停留在人类精神最原始的阶段而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史前史,这些偏见在现代西方世界仍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无论这种偏见多么顽固,中国哲学史研究在 20 世纪的进展和成就,已经用事实粉碎了有关的谰言。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惟一类型和普遍模式,因而有关中国哲学的性质、对象和范围,都以西方哲学为框架来规定和裁剪,并完全用西方哲学的范畴与话语系统来诠释,因而中国哲学史便成为西方哲学史的插图或注脚。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史在中国历史上的“投影”,而不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确立时期,这种现象自有其历史的理由,根本无法阻挡和避免。可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工作之后,现在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和本来的面目,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错误的观念。在整个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哲学是一种类型,中国哲学也是一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有共性和普遍性而可以相通,同时又各有个性和特殊性而不能彼此约化。只有努力把握中国哲学的个性和特殊性,才能说明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才能说明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才能丰富世界哲学史的内容。

中国哲学史基于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和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具有自己特殊的主题,这就是“通天人之际”,即从整体上贯通天道、人道而把握其关系。中国哲学史上所讨论的道理、性命、名实、形神、有无、动静、言意、道器、理气、心物、知行、古今等问题,归根到底都以“天人之际”为中心,都可以概括在“天人之际”的范围内。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天人之学”,每一种新的哲学体系也就是一种“天人新义”。“天人之际”问题与西方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但既不是同一关系,也不是包含关系。“天道”必涉及万物的存在,不能不研究存在问题;“人道”必涉及人的精神心理,也不能不研究思维问题。但是中国哲学家不喜欢把天地万物抽象为一种纯粹的“存在”,而总是努力探讨天地自然同人的有机联系,天地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哲学家也不喜欢离开人的生存与发展而抽象地讨论思维问题,而总是努力探讨人的思维如何上达天道、符合人

道。所谓“天人一性”、“天人一体”、“天人一物”、“天人一理”等,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理念,即“天”是人之天,“人”是天之人。基于这种理解,中国哲学家坚持“天人”关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并要在天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和谐的,甚至有感情的关系。各家各派的哲学分歧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天人关系,如何处理天人关系。其他一切问题都由此而来。只有抓住这个中心,抓住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当然,中国哲学史上也有西方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这在名实、形神、心物等问题中比较突出和明显,但不是一条主线,并非每个哲学家都可以恰当地定性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而这种定性亦未必就能抓住其思想的实质。老子和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大人物,他们的哲学思想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至今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中国哲学史不但具有自己特殊的主题,而且具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在西方,“哲学”的本义为“爱智”,“智”被归结为“知识”和“认识”的范畴,并且主要是有关自然物理的知识或认识。因此西方哲学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相当发达。在中国,哲学当然包含着关于天道、人道的普遍性的知识,这是民族智慧的集中表现,但许多哲学家对自然物理的知识重视不够。而除了知识的层面之外,中国哲学还有其德行的层面和感情的层面。中国哲学从来都不单纯是一种说教,而总是同做人,即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关人性论和修养论的内容最为丰富。哲学家提出任何一种学说,都要说明它对做人的意义,它对民族和社会的价值。同时要亲身履行,在自己的行为中体验和证明,通过自己的人格显示其学说的生命和力量。所以,研究中国哲学不能只限于“立言”的文本,而且要“知人”,“知人”才能进入哲学家的精神世界,才能领会其哲学的精神实质。中国哲学还非常重视“情”与“理”的统一,哲学家大多都有一种达观天人或悲天悯人的心态与感情,并企图通过自己的思想学说而使人们“心安理得”,能够“安身立命”。最大的“理得”就是上达于天道、人性的领悟与觉解,最大的“心安”就是自我精神世界的协调与平衡,“安身立命”则是明确个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哲学的这种特征对民族的精神生活与感情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从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追求主要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与“中和之道”,而和谐则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理念。“天人合一”不但包含着人类群体与自然界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个体自我在精神上的和谐。“知行合一”不但要求理论必须付诸实践,而且所知所行的内容亦追求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和谐。中国哲学在理论结构、范畴体系和思维方式诸方面也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这些方面都应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哲学进行同异比较,而深入地去研究。

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而一切正确的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人们往往有不同的认识与评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尊重史料和尊重史实的客观态度,是最基本的要求。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涂抹历史、篡改历史、歪曲历史,同严肃的学术研究是不相容的。完整地、系统地把握“实事”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从“实事”中“求是”更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在中国历史上,有汉学的方法,有宋学的方法,各有长短得失,我们今天应该相互为用,进行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它能帮助我们揭示中国哲学发生发展与源流演变的历史过程,又能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层次、逻辑结构与逻辑规律。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发生学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等等,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它们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价值。

中国哲学史既属于哲学的门类,又属于历史学的门类,这种交叉性的特点与地位,规定了这门学科的任务与功能。中国哲学史首先要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或历史线索,这是它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要深入地揭示中国哲学思想的逻辑演变及其发展规律,这是它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基本要求;再次,认真地研究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其演变的规律,这是它作为人类精神反思的基本要求;最后,全面总结中国哲学智慧的长短得失,继承和发扬其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直接目的。中国历代哲学的理论成果,其中许多具有积极、肯定的价值,这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思想精华和智慧资源,但也有不少消极的、负面的内容,则属于历史陈迹与文化糟

粕。困难的问题就在于这两个方面常常交织在一起,我们一定要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整体上说是如此,就各种思潮和各个学派及有关学说而言也是如此。例如,中国哲学一向追求“天人合一”,重视人类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与协调,这对于我们解决当今人类生态问题仍能提供宝贵的启示。但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不明确,亦抑制了对自然界与人自身的对象化的认识。儒家对至善的追求,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自觉及美好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但在这种思维倾向和价值取向中,真的追求与美的追求都被完全纳入道德价值体系。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固执“守雌用柔”的取向与“不为天下先”的态度,也明显有其片面性。我们今天评判古人的是非得失,并不是自视高明,而是以此为鉴要继续向前看,向前走,以解决中国现代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正在从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不但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智慧资源,而且有助于锻炼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终究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① 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工作者而言,中国哲学史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功夫。对于每个人而言,则有助于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自觉的精神修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学科。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地探索和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只有扎扎实实地工作和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不断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才能使中国哲学史学科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4页。

目 录

编者说明

导言	(1)
----	-----

第一编 中国哲学的萌芽与开端(史前至殷末周初)	(1)
-------------------------	-----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萌芽(史前至夏殷时期)	(4)
----------------------	-----

第一节 中华先民原始思维的发展	(4)
-----------------	-----

第二节 创世神话中的世界图式与万物来源	(6)
---------------------	-----

第三节 宗教信仰中的灵魂观念与人神关系	(10)
---------------------	------

第四节 社会实践中的实在信念与人文智慧	(13)
---------------------	------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开端(殷末至周初)	(16)
--------------------	------

第一节 《周易》古经的阴阳观念与变易观念	(16)
----------------------	------

一、《周易》古经的时代	(16)
-------------	------

二、《周易》古经的性质	(17)
-------------	------

三、《周易》古经的阴阳观念	(19)
---------------	------

四、《周易》古经的变易观念	(20)
---------------	------

五、《周易》古经的吉凶观念	(21)
---------------	------

第二节 《尚书·洪范》的五行观念与睿思观念	(23)
-----------------------	------

一、《尚书·洪范》的时代	(23)
--------------	------

二、《尚书·洪范》的五行观念	(24)
----------------	------

三、《尚书·洪范》的睿思观念	(27)
----------------	------

第三节 周公的天命、敬德和礼乐观念	(27)
-------------------	------

一、对传统天命论的改造	(28)
-------------	------

二、“敬德”与“保民”的关系	(29)
----------------	------

三、“制礼作乐”中的人文教化观念	(30)
------------------------	------

第二编 中国哲学思想的开拓与哲学学派的形成

(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	(33)
第一章 先哲们的思想开拓	(35)
第一节 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思想开拓	(35)
一、阴阳观念的发展	(35)
二、五行观念的发展	(36)
三、“和同”与“有两”、“陪贰”的辩证思想	(37)
四、敬德观念的发展	(40)
五、重民观念的发展	(41)
六、无神论思想的活跃	(43)
第二节 管子与晏子的哲学思想	(44)
一、管子的哲学思想	(44)
二、晏子的哲学思想	(48)
第三节 子产与范蠡的哲学思想	(52)
一、子产的哲学思想	(52)
二、范蠡的哲学思想	(55)
第二章 老子的道论与道家学派的形成	(59)
第一节 老子的思想渊源	(60)
第二节 “道”的抽象及其本原意义	(62)
第三节 “道”的作用与“道”的辩证法	(65)
第四节 “自然无为”的治国之道	(68)
第五节 “为道”与“为学”的区别	(70)
第六节 老子哲学的历史地位	(71)
第三章 孔子的仁学与儒家学派的形成	(73)
第一节 孔子的思想渊源	(73)
第二节 宗教意识与现实精神	(75)
第三节 从“礼”进至于“道”	(78)
第四节 “仁”的整合与“人”的反思	(80)
第五节 教育过程中的认知理论	(83)

一、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	(84)
二、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	(84)
三、“学”与“思”的关系	(85)
第六节 修养方法与精神境界	(86)
第七节 孔子思想的历史地位	(89)
第四章 孙武的“知彼知己”与兵家哲学	(91)
第一节 “五事”、“七计”与战争的整体观念	(91)
第二节 “知彼知己”的军事认知理论	(93)
第三节 “奇正相生”的军事辩证法	(94)
一、从天道的变化看战争的矛盾运动	(95)
二、根据矛盾的变化灵活地运用战术	(95)
三、因势利导与战争的主动权	(97)
第五章 墨子的“兼爱”与墨家学派的形成	(99)
第一节 墨子的思想渊源	(99)
第二节 “兼以易别”的社会思想	(100)
第三节 “非命”与“天志”的内在矛盾	(103)
第四节 推崇功利的价值取向	(105)
第五节 注重经验的认知理论	(107)
一、“三表”法的成就与局限	(107)
二、认知中的理性成分	(108)
第六节 墨子思想的历史地位	(109)
第三编 百家争鸣与诸子哲学的活跃(战国时期)	(111)
第一章 《五千言》与道家哲学的新趋向	(115)
第一节 《五千言》的作者与时代	(115)
第二节 老子道论的思辨化	(116)
第三节 老子道术的权术化	(118)
第四节 道家与儒家的对立化	(120)
第二章 黄老学派对道家哲学的发展	(122)
第一节 《黄帝四经》的道家哲学	(122)
一、从“道”至“理”的思想开拓	(122)

二、辩证法中的思想新意	(124)
三、以“道”论“法”的政治哲学	(126)
四、修道的内容和价值	(127)
第二节 《管子》中的黄老道家哲学	(127)
一、从“道”到“精气”的思想开拓	(128)
二、“心术”论的两重意义	(130)
三、道、法结合的政治哲学	(131)
第三章 子思、孟子对儒家哲学的发展	(133)
第一节 子思的中庸哲学与道德“五行”说	(133)
一、“中庸”思想的哲学展开	(133)
二、道德“五行”的新系统	(136)
第二节 孟子的心性哲学与义利观	(138)
一、推行“仁政”的“王道”理想	(138)
二、性善论与心性修养	(140)
三、义利观念的重大转向	(143)
四、圣人观与历史观	(144)
第四章 庄子学派对道家哲学的发展	(148)
第一节 庄子的道论与气论	(148)
第二节 “齐物论”的两重意义	(151)
第三节 追求精神自由的“逍遥游”	(155)
第四节 精神超越的修养方式	(157)
第五章 名辩思潮与名家哲学	(159)
第一节 惠施的哲学思想与名辩内容	(159)
一、关注万物的哲学取向	(159)
二、“历物之意”的十个辩题	(160)
第二节 公孙龙的哲学思想与名辩理论	(163)
一、名实论与指物论	(163)
二、白马论与坚白论	(165)
第六章 后期墨家的哲学思想与名辩逻辑	(168)
第一节 后期墨家的哲学思想	(168)

一、后期墨家的时空论与运动论	(169)
二、后期墨家的认知学说	(170)
第二节 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与逻辑理论	(173)
一、“以名举实”的名实观	(173)
二、“名”的分类与概念的分类	(174)
三、“辞”的意义与判断的形式	(175)
四、“说”的意义与推理的形式	(175)
第七章 《易传》的形上追求与辩证法思想	(177)
第一节 《易传》的哲学层面与术数内容	(177)
第二节 《易传》的道器划分与形上追求	(178)
第三节 《易传》的宇宙发生论及世界图式	(181)
第四节 《易传》的辩证法思想	(182)
第八章 阴阳家的宇宙图式与历史观	(187)
第一节 阴阳家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	(187)
第二节 阴阳五行相配的宇宙图式	(189)
一、“称引天地剖判”的宇宙发生序列	(189)
二、阴阳五行相配的宇宙图式	(190)
第三节 “五德终始”的历史观	(191)
第九章 荀子对儒家哲学的发展	(193)
第一节 旨在“一天下”的社会理想	(193)
第二节 性恶论与礼法观念	(194)
第三节 “天人分职”的天道自然论	(197)
第四节 “明分使群”的社会历史观	(199)
第五节 关注“物理”与系统化的认知学说	(202)
一、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	(202)
二、认知过程的两个阶段	(203)
三、“虚壹而静”的主体心态	(204)
四、“兼权”以“解蔽”的思想方法	(205)
五、“学至于行”的知行观	(206)
六、“制名指实”的逻辑理论	(207)

第十章 商鞅与韩非的法家哲学·····	(211)
第一节 商鞅与韩非的历史进化论·····	(211)
第二节 韩非的利害论与法哲学·····	(213)
第三节 韩非的矛盾学说与参验方法·····	(215)
一、矛盾概念的双重意义·····	(215)
二、矛盾双方的关系·····	(216)
三、“参验”在认识中的作用·····	(217)
第四节 韩非对道与理的新诠释·····	(218)
一、道与理的规定·····	(218)
二、道与理的关系·····	(220)
三、人对道与理的态度·····	(221)
第四编 儒家经学的统治与不同的哲学倾向(两汉时期)·····	(223)
第一章 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家哲学·····	(227)
第一节 汉初的黄老哲学思想·····	(228)
一、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和影响·····	(228)
二、汉初黄老之学的思想特征·····	(229)
第二节 汉初的儒家哲学·····	(231)
一、陆贾的儒家哲学·····	(232)
二、贾谊的儒家哲学·····	(234)
第二章 《淮南子》的哲学倾向·····	(238)
第一节 《淮南子》的天道观·····	(239)
一、天道自然·····	(239)
二、天道无为·····	(241)
三、天人感应·····	(242)
第二节 《淮南子》的人性论与形神论·····	(243)
第三节 《淮南子》的历史观·····	(246)
第三章 董仲舒与今文经学的哲学特点·····	(250)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思想特征·····	(250)
第二节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254)
一、“天人感应”的天道观·····	(255)